



人·民·文·庫
人文科学·撰著

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

【下册】

汪敬虞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版

人·民·文·庫

人文科学·撰著

ISBN 978-7-01-010755-4



9 787010 107554 >

总定价：245.00元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

【下册】

汪敬虞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海源 郑海燕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智福和 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全3册/汪敬虞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
(人民文库)
ISBN 978-7-01-010755-4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中国经济史—1895—1927
IV. ①F1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5528 号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

ZHONGGUO JINDAI JINGJISHI (1895—1927)

汪敬虞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75
字数:1910 千字

ISBN 978-7-01-010755-4 定价:2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人民文库》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连儒 王善迈 止 庵 田士章 叶秀山
庄浦明 庄福龄 张立文 张世英 张作耀
张惠卿 张静如 吴道弘 陶文钊 顾锦屏
蔡美彪 薛德震

主 任 黄书元

副主任 陈有和 张小平 任 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国根 李春生 乔还田 刘丽华
张文勇 张振明 张耀铭 陈亚明
陈鹏鸣 郇中建 喻 阳

第 三 篇

中国资本主义在各产业部门中的发展状况

第十二章

工 矿 企 业

第一节 近代民族工矿业初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工矿业有了初步发展的机会。它既是在人民群众反帝救亡运动直接推动下的产物,又有社会政治的历史背景。

一、清政府对工矿企业体制的改弦更张

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工矿企业是在官的倡导和约束下进行运转的。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四种经营形式中,以官督商办为主体。战后一方面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开始过渡到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新阶段,中国面临被列强肢解的严重危机。在 19 世纪末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外国资本争相拥入,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势引起了社会动荡,也引发了群情激奋。在工业领域中的“设厂自救”,便成为应付危急情势、救亡图存的对策。另一方面,战争失败后的沉重的赔款和每年偿还的外债本息,极其严重地破坏了清政府在此前 10 年间勉强维持的财政平衡。战后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狼狈景象集中表现在:“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

力,而更无以相抵。”^①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清政府再也不可能对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注入新资本;同时它也不能不对历年奉行的经济政策进行反思、调整和改变。在1895年8月,光绪皇帝发布的“上谕”说:“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貲,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②于是“恤商惠工”、“振兴工艺”政策开始被提升到治国“本源”的地位。^③

事实上,清政府历年推行的官办、官督商办体制到甲午战争前夕,已经充分暴露了它们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就官督商办制度而言,在甲午战前的20多年中,商人在这种类型的企业里陆续投注了相当数量的资本,然而操企业经营大权的,是为数不多的洋务派官僚及其亲信。这种官无资而有权、商出资而无权的极不合理的现象,严重地挫伤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社会舆论对“本集自商,利散于官”^④的指摘,折射出这一期间民间资本家的愤懑。所以到19世纪90年代,企望发售股票招徕社会资本的活动,不能不遭到商人资本的强烈厌恶和抵制。比如,1896年,张之洞将官办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体制,他满以为通过盛宣怀可以调动长江中下游沪、汉商人资本的到来;不料沪、汉商人报之以极大的冷淡,以致汉阳铁厂改变体制时所需资金,几乎全是盛宣怀筹划的个人资本。^⑤1895年具有官绅双重身份的张謇为创办大生纱厂,也因资本筹集上遇到了重大困难,迫使大生纱厂的筹建过程经历了

① 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第1卷,第6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128卷,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31页。

④ 汤震:《危言》,光绪十六年(1890年)刊本,开矿篇,第2卷,第16页。

⑤ 参见代鲁:《再析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商办”、“官商合办”和“绅领商办”三个阶段；特别是在“官商合办”期间，由于纱厂领用官机，引起了一部分已入股的商人“疑畏”官方的干预，观望不前，“各有退志”；未入股者更存“戒心”。^① 张謇在集资建厂过程中所遇到的难以状述的重重困难^②，也充分说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在甲午战后声名狼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民间资本对“官”的“疑畏”，已经是根深蒂固。面临如此严峻的现实，清政府在推行“振兴商务”、“恤商惠工”方针时，除了把商品性的生产事业向民族资本家广为开放外，已无其他出路。甲午战争后，广大工商业者纷纷要求破除官府垄断，自由发展近代工矿企业的行动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清政府的“恤商惠工”政策不过是顺应这一时势。

二、民族工商业组织的兴起和 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

从中国社会经济全局变化来看，以民间商人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商会和其他经济团体的产生和蓬勃发展，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在阶级组织上的体现。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是在同外国接触过程中逐渐了解商会作用的。他们目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务活动中都有

① 参见大生系统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14 页。

② 参见《通州兴办实业史》，第 111 页；《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 1 卷，第 11 页。

商会参预其间,“凡官设商肆,定税则,皆必与商会相商”^①;即使是旅居中国的外商,也都在其居留地组织商会,影响或干预各地商情。有说“凡各大埠皆西商为主,而华商听其调度,凡市面行情银价,一皆听于西人”。^② 这个说法容或有些夸张,不过在华西商商会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见的。所以,经济势力日见增长的各大埠的华商,不断呼吁迅速建立商会,为的是“以集商议,以重商权”。^③

在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多次提出创办商会的主张,曾为光绪所采纳。1898年,清政府责成刘坤一、张之洞在沿海沿江城市设立商务局。当时上海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经元善、徐润等在当地筹设商学会;旋因维新变法失败而消散。

官设商务局名义上也倡言振兴商务,可是清政府规定商务局只任用候补官吏,不得任用商董。晚清以来,官、商长期隔阂,积不相能,工商界对这种官办商务局多持不合作态度,商务局根本不能发挥联络工商的作用。在这方面,张之洞、盛宣怀都深具同感。他们也认为“局为官设”的局面如不改变,振兴“商务”的要求无从奏效。

1901年,清政府商务大臣盛宣怀在上海主持修订对外商约,痛感谈判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有一个商人组织协助,以了解经济力量日益增长的上海商界的意见和主张。在当时的急切情况下,盛宣怀通过时任上海道袁树勋会同上海著名绅商严信厚等,于1902年2月22日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又经盛宣怀、张之洞奏准,派严信厚为总理,为进行中的商约谈判起咨询作用。^④ 嗣后天

① 汪康年:《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时务报》第47、52册。

② 汪康年:《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时务报》第47、52册。

③ 汪康年:《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时务报》第47、52册。

④ 参见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津绅商于1903年仿照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经直隶总督袁世凯批示同意,成立天津商务公所^①;同年,经张之洞奏准,汉口也创设商业会议公所。^②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商部,专司工商事宜,宣称“以保商为己任”。^③翌年,清政府又核准颁行《商会简明章程》26条,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份隶属于商务总会”;并命令“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会及商务分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现定部章,一律改为商会,以归划一”。^④按照此项规定,成立已达2年又3个月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遂于1904年5月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同年11月,天津商务公所也改组为商务总会,随之全国各通商大埠相继创立商会;外洋各埠华侨商人聚集之处,纷纷设中华商务总会。

至此,人们不难看到,与社会经济相应发展的是,地区性的商业会议公所逐步地嬗变为全国性的工商统一组织即商会。民族资产阶级从此有了为本阶级利益呼号奔走的社团;它又进而揭出“联商情、开商智,以扩商权”的宗旨,起着沟通官府以及与其他社会势力相联络的作用。

在商部推动下,1904年,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商会和商务分会有29家。又经过两年,到1906年,各省累积便在100家以上,到

①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05卷,第8页。

③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1984年版,第5253页。

④ 据光绪二十九年商部:《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原件藏天津市档案馆,转见徐鼎新等:《上海总商会史》,第59页。

1912年,历年累积已达1000家左右^①,显见商会及其分会发展速度之迅速。

于此应该指出,商会的产生和初期发展虽得助于清政府商部的“劝办”,但是,商会在短期内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主要的还是由于它所揭示的宗旨和所力行的方针,如兴办实业、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等等,实际上都曾为民族工商业者多年营营以求的目标。现在他们期望借商会的推动,达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1903年下半年,天津30余行业、61家行董集体要求从速成立商会时,一致认为:“天津商埠为总会〔汇〕之区,彼沿海各商埠总会现皆举办,天津独瞠乎其後,无惑乎商务之收效迟也。”^②天津商人把当地商务的不振归咎于商会之不及时设立,正是有力地反映了他们对成立商会的作用寄予殷切心情。应该说天津商人在当时的急切要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才是商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的主导原因。

各地商会及其分会成立以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内商业活动中,它们通过维持市面,活跃商业运作。尤其当市面头寸告紧、出现金融风潮的苗头时,商会则尽力利用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参与缓解金融危机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金融的损失;此外,如遇有商讼则进行调解;抵制苛捐杂税,敦促政府改良税制;同时“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难,代诉冤抑以和协商情”。^③至于在抵制外货扩张上,商会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都

① 参见《各省商会详表》,《中国年鉴·第一回》,第1544—1570页;《中华民国二年第二次农商统计表》。

② 《天津商会档案史料汇编》(1903—1911年)第1分册,第30页。

③ 《上海商务总会章程》,转见徐鼎新等:《上海总商会史》,第62页。

波及全国十几个省大中城镇,各省商会及其分会在这些运动中都起了有力的作用,使抵制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规模。

在商会组织之外,1910年又建立了由资产阶级组织的实业团体。当年10月,随着南洋劝业会召开,在上海、天津实业界和商会代表的推动下,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实业协会在上海成立。会议通过的章程强调“以联络实业各界调查全国实业,研究进行方法,以发达国人之企业能力为主要宗旨”。^①这次盛会有29省商会代表和实业界一百余名代表参加,是实业界一次空前的大规模集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风云驰骤,南京临时政府遂于1912年1月成立,旧邦新造,社会上更兴奋地掀起振兴实业热潮。这时民族资产阶级渴望政治革命带来“产业革命”的愿望,于是1912年年初,便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在上海成立,开宗明义,揭出了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旨趣,说:“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夫社会经济,坠落久矣,金融也,交滞;机关事业也,悉成荆棘。……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社会。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虽然,欲事建设,须萃人才,抑不有团体,亦无以厚其努力。”^②这种热情提倡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的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心向背的倾向。

同年10月,由一批工商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华实业团”,揭示宗旨,为“谋国民经济之发达,助共和政治之进行”,同时结合国内具体情况,指出“民国光复以来,库藏空虚,民储刮尽,国困民窘,莫盛斯时,实业一门岂可再忽”?主张在全国“提倡厚集资本,

① 徐鼎新等:《上海总商会史》,第108页。

② 《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转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861—862页。

振兴百端实业,创办民立银行,以维持金融,提倡出口,以挽回外漏利权”等等。^① 中华实业团在成立过程中,曾获得各阶层人士的响应,工商界人士纷纷加入实业团。

除了上述成立的全国性实业团体之外,各地也纷纷建立起地方性的实业团体。如西北实业协会、安徽实业协会、苏州实业协会、镇江实业协会以及黑龙江省实业总会等等,特别是上海的同仁民生实业会,是由华侨银公司总经理徐锐、华侨联合会会长吴世荣、新加坡代表丘醒火、旧金山代表邝尧阶等爱国侨胞发起成立的。揭出的宗旨在注重民生,强调“对于已办之实业极力保护,未办之实业设法提倡”,在国内外都发生重大影响;国内如安徽、江西及江苏扬州等地,都着手设立分会,到1913年,国外华侨入会者已有20余万人之多。^②

辛亥革命胜利后,实业团体在国内工商业重要城市风起云涌,并受到工商各界及各行各业热情推动和鼓励,一时间在全国掀起实业建设的高潮。它为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做出了鼓舞人心的积极贡献。

三、抵制外资、收回利权对民族工矿企业的促进

甲午战争后10余年中,与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日见发展的同时,国内外市场处于持续扩大的过程中。海关贸易统计表明:从1895年到19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从31500余万关两扩展到84400余万关两,15年中,进出口总值增加近1.7倍。分别来

① 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862—863页。

② 《时报》1913年3月29日,转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867页。

看,同期中进口净值从 17100 万关两扩充到 46300 万关两,增达 1.7 倍;出口值则从 14300 万关两上升到 38100 万关两,也增达 1.66 倍,说明进出口值的发展速度几乎是同步提高的。

这一时期,在国际上正是西方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过剩资本急于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寻求出路。列强在中国进行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实质上就是为各自的过剩资本追逐出路的集中表现。它们力图开发中国矿藏、抢筑铁路的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广泛开展以收回路矿主权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在全国广泛地展开,它标志了民族资本主义力求突破帝国主义构筑的垄断局面,求得自身的发展。

在开展收回利权运动的同时,在我国又爆发了全国性的抵制洋货的运动。

发生于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最先掀起的一个浪潮。为了反击美国资产阶级加剧排华暴行,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美爱国运动。这次运动在经济斗争上则以抵制美货为其主要内容。全国主要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和汉口等地民族工商业者在商会领导下,集会决定“不用美货,不订美货”。^①影响所至,迅速地使美国商品的输入量自运动开展以后,频年不断下降。海关统计数字反映:1905 年,我国对外贸易上全国净输入总值在 4.4 亿余关两,其中由美国输入值达 7600 万余关两,占当年我国外贸进口净值的 17.2%。抵制美货运动开展起来后,美货输入迅即下跌,1906 年全国输入总值为 4.1 亿余关两,美国商品输入值便降为 4400 万余关两,占当年我国输入总值的 10.8%;

^① 《时报》1906 年 2 月 3 日。

1907—1909年,美国输华商品总值无论在绝对数值上或占我国当年输入总值的比重上,均呈现为不断跌落的景象。1910年,情况更为严重,当年我国对外贸易的输入总值为4.6亿余关两,其中美国商品的输入值只有2400万关两,仅占我国输入总值的5.3%。^①美国商人目击该国商品输华值连年剧烈跌落,极为焦急。他们忧虑,如果“中国不用美货之举动坚持不懈,美国各厂家须闭歇六个月。现下所出之货只可运销于本国及南非洲,远东销路业已大坏”。^②

在抵制美货运动高潮迭起的过程中,清政府受到美国,以及由美国策动下的英、法、俄、日等帝国主义施加的压力下,不但不敢支持,反而在1905年8月21日和31日接连向各省督抚下达命令,镇压各省群众的抵制外货运动。8月31日的“上谕”甚至说:“中美两国睦谊素敦,从无彼此抵牾之事。所有从前工约,……自应静候外务部切实商改,持平办理,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著再责成该督等,认真劝谕,随时稽查,……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以弭隐患。”^③于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的周馥、两广的岑春煊等为讨好美国势力,都先后进行镇压、制止的活动,袁世凯甚至向天津商人“示禁”,“令勿附和上海商会抵制华工禁约之举”。^④

但是,在人民群众反帝觉悟不断上升时节,清政府的镇压显得软弱无力。当一些执行清政府命令的官员在目睹抵制运动中群众

① 贸易统计数字均见杨端六等:《六十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05、106、110、118、121页。

② 《时报》1905年11月9日。

③ 《清实录》,德宗朝,第548卷,第1—2页。

④ 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研究》1956年第1期。